

亨利·乔治经济 思想述评

陶大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评

陶大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评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625印张 188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册

统一书号: 4190·098 定价: 0.81 元

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代序）

——从平均地权纲领探索孙中山的思想渊源

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在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他奔走革命，追求真理，不仅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中国的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且以敏锐的眼光，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辛亥革命时期，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鞠躬尽瘁；在他的晚年，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推动和帮助下，毅然提出著名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力量的真诚的朋友。他不愧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首要代表和伟大思想家。

孙中山从一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朋友，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血腥侵略和满清王朝的昏庸腐朽，激发了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894年，他曾《上李鸿章书》，提出“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①，未被采纳；不久，中日甲午战争惨败，面临

① 孙中山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参见《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民族危亡，他进一步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①，抛弃了自上而下实行某些改良的幻想，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同年秋，他胸怀大志，再度到檀香山，联络爱国侨胞，宣传革命思想，为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②，组织了兴中会。在吸收会员的誓词中，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政治纲领。次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孙中山立即筹备武装斗争，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反清起义。这次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海外，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1896年，从美国转到英国，在伦敦遇难，被羁囚在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通过英国官方的交涉，孙中山终于获释。脱险以后，他在伦敦继续居留了一年光景。在这段时期，他似饥如渴地博览群书，经常到英国博物馆的图书室，饱览了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文学以及各类报刊，接触到诸如卢骚的《民约论》、富兰克林的《自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资产阶级名著，刻苦钻研各派政治、经济理论，希望从中找到救国的真理。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以及欧洲大陆上工人运动的影响，英国也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组织^③。1884年，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年)曾再度到伦敦来，他的著作和演讲，曾经鼓动了许多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使他们关心经济问题。而“八十年代中的英国社会主义领袖有五分之四是受过亨利·乔治的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② 见《兴中会宣言》，同上书，第19页。

③ 1881年建立了民主联盟；1884年改称社会民主联盟，同年，费边社也宣告成立。

教育的。”^①孙中山侨居伦敦的这一年，正是英国工人运动趋于高涨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相继涌现的^②时刻，一定会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学说，并且目睹伦敦产业工人举行的总罢工以及遭到迫害的惨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祸害”，已经有所察觉，逐步形成了他那套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三民主义。他后来追忆当年，曾有这么一段自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③看来，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在1896——1897年旅欧期间已经开始形成了。

当时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同土地改革运动还是联系在一起的。^④因为，七十年代的农业危机，席卷了西欧各国，爱尔兰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1879年“土地联盟”宣告成立，爱尔兰的土地问题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当年问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在美国虽未畅销，在英国却争购一空^⑤，亨利·乔治的声望很快就轰动全球。各国倡导土地改革的许多团体，纷纷邀他前往演讲。从1881到1890的十年间，他曾先后到爱尔兰（1881——1882年）、苏格兰和英格兰（1882、

① 可参阅马克思·比尔（M·Beer）：《英国社会主义史》，第4篇，第12章。

② 英国独立工党成立于1893年，恩格斯虽对该党的领导者表示不信任，但在原则上仍祝贺它的成立。

③ 《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

④ 在“费边社”宣布的纲领中，就提到“社会的改造依赖于土地和产业资本的解放，以谋公众的福利”、“废除土地私有及地租”等。

⑤ 到1882年，在英国已销售10万本左右。

1884、1888年)、法国(1889年)、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1890年)等地作旅行演讲,鼓吹自己的土地纲领。所以,孙中山居留英国期间,当会读到亨利·乔治的这部名著。在他后来的一次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1911年)中,对该书曾推崇备至:“美人有卓尔基亨利(即今译的亨利·乔治)者,一商轮水手也。赴旧金山淘金而致富,创一日报,鼓吹其生平所抱之主义,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①可以这样说,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基本思想和纲领,曾经直接受着亨利·乔治经济思想的影响。

当然,除了亨利·乔治,孙中山也可能从别人的著作中吸取精义。因为,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在英国已经开始了土地国有运动,有关地价税、地租国有化以及土地国有论的主张,散见于当时的各种书刊中,甚至象赫伯特·斯宾塞和约翰·穆勒这样鼎鼎大名的资产阶级学者也都鼓吹“全部土地并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整个人类所固有的遗产”^②,孙中山是否浏览过他们的一些代表著作,我们难于肯定;但从他的那种钻研精神以及他在民生主义中所阐发的全部内容来看,显然曾受多方面的思想影响。他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③在流亡的岁月里,他生活困窘,有一次几乎断炊,一些华侨

① 见《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参阅《孙中山全集》,正集第3集,上海三民公司1932年版,第12—13页。

② 斯宾塞和穆勒同为英国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俩对亨利·乔治早年经济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一书。

③ 见《孙中山先生逸语》,1935年版,第51页。

筹集了三、四十英镑接济他；不到三天，他把这笔钱统统用来买了新书，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真是到了穷根究底、废寝忘食的程度。因此，象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华莱士（A·R·Wallace）的《土地国有化》（1882年）等当时影响较大的同类经济著作，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纲领，他是想通过民主革命来解决土地和资本这两个问题。正如他自己所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弄到人人生活上经济上平等。”^①“提倡民生主义，讲到归宿，不得不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②在他看来，只要实行了这两个纲领，在中国革命后就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了。所以，从本质上看，孙中山在主观上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当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把民生主义同社会主义看成一个东西。他这样说过：“民生主义，就是时下底（的）社会主义。”^③

但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发展线索来看，显然平均地权的理论和纲领，要比节制资本纲领的酝酿、成熟得早。在1905年8月的《同盟会宣言》中，已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大纲领，跟兴中会时期的政治主张相比，最突出地就是增添了“平均地权”的经济纲领，并且作了如下的阐明：“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

① 《同胞都要奉行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正集第3集，第54页。

② 《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同上书，第45页。

③ 同上，第42页。还说：他“把‘社会主义’的原文译成‘民生主义’在意义上似乎较为妥当。”

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①这里初步提出了土地增价归于国家的主张，似更接近于约翰·穆勒的国有化方案。穆勒也把地价增殖部分归于不劳而获的收入，认为国家应征收一种“土地税”(Land tax)，我们“不能把它看做一种税收，而应看做一种有利于公众的地租负担，这部分地租一开始就归国家所有，它永远也不属于或构成地主的收益部分。”^②孙中山的上述主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着亨利·乔治的影响、还是直接受到约翰·穆勒的薰染，我们尚难于判定。因为，在亨利·乔治的心目中，穆勒是亚当·斯密以后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最高权威”和“最受欢迎的注释者”^③，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对亨利·乔治的经济研究曾经有过很大的启发，穆勒所阐述的一些有关地价是“不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的论点，在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中也都有所发挥，尽管亨利·乔治在书中并没有详细引证穆勒的原著，这也不足以排除他在实际上接受穆勒主张的可能性。何况，在1870年7月16日他给穆勒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为了竭力论证贫富现象在英国的继续存在以及那些较老国家内工人阶级状况的日益衰颓，我所得出的结论在您的著作中都已明确而有力地指出了。”^④这虽语焉不详，但从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他当时在土地问题上刚从穆勒的书中得到了新的启发，才写信去表示敬意的。另在他致友人威尔斯(David Ames Wells)的信(1871年

① 见《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② 详见《政治经济学原理》，1873年伦敦版，第5篇，第2章，第5、6节，第492—494页。

③ 见亨利·乔治：《政治经济学的科学》，1932年伦敦版，第139页。

④ 参阅巴克(C. A. Barker)：《亨利·乔治》，1955年纽约版，第138页。

10月26日)中,也承认“在研究土地税时追随过穆勒。”^①所以,孙中山在旅欧期间,很可能对亨利·乔治和穆勒的两部名著都曾攻读,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基本思想,更适合他当时的需要,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考察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纲领的思想根源时,我们仍然应该追索到他与亨利·乔治在经济思想上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

所以,一般说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已初步形成;具体地说,直到同盟会宣告成立,平均地权才作为一项正式的政纲被规定下来。隔三月(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才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号召,三民主义才成为同盟会四大政纲的理论基础。在同盟会成立的前后,他虽已认识到“欧美强矣,其民实困”、“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②,并且深刻地指出“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自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但“节制资本”毕竟还没有作为一项经济纲领正式提出,他仍认为欧美之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③直到辛亥革命后,他才进一步强调“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④后来,

① 威尔斯(1828—1898年)为美国庸俗经济学家。转引《亨利·乔治》,第152页注。

②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1页。

③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1906年)。同上,第77页。

④ 《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1912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8页。同年,在“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这篇演讲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第93页)

在国民党的党纲里，“节制资本”才与“平均地权”一起列为民生主义的“两个办法”^①。但在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平均地权仍占极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②

很明显，当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思想上是相当模糊的。他有时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有时把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题”，有时又说“……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③同时，他除了推崇亨利·乔治，也对马克思的“共产社会主义”深表敬意，认为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④并且把马克思与亨利·乔治相提并论，说“亨氏（即指亨利·乔治）与麦氏（即指马克思，孙中山当时译为麦克司）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世界地面本属有限，所有者垄断其租税，取生产三分之一之利，而坐享其成，与工作者同享同等之利益，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者。……故土地之一部分，据社会主义之经济学理，不应为个人所有，当为公有，盖无疑矣。亨氏之说如是。麦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主张虽各不同，而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综二氏之学说，一则土

①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88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6页。

③ 分别见《孙中山全集》，正集第3集，第7页；《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70、800页。他还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第797页）

④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70、772页。但是，他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却并不理解。

地归于公有，一则资本归于公有”。“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①孙中山的上述言论，发表在辛亥革命那一年，这表明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基本上已经形成，但当时仍以平均地权纲领作为主体，并对亨利·乔治的主张无条件地予以接受，但他认为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他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②因此，他不主张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即“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去解决，他这样说过：“不必全法欧满（指满清皇室）之激烈对待，而根本学理，和平防止可矣。”^③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对亨利·乔治的那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土地纲领和盘接受下来以后，还误认为“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④，这恰恰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局限性。正如列宁在评价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时所指出：“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⑤在

① 《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孙中山全集》，正集第3集，第13、15页。他还曾提到：“麦克司之《资本论》，主张资本公有。”亚当·斯密是“旧经济学派”，马克思是“新经济学派”。（第14、15页）

② 分别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79、797、802页。

③ 《孙中山全集》，正集第3集，第22页。

④ 同上书，第13页。

⑤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5页。

我们从土地纲领探索孙中山的思想渊源时，首先认清这一点，还是十分重要的。

二

现在，我们再深入一步，探索一下孙中山究竟从亨利·乔治那里吸取了多少营养，并且在哪些地方又有了新的发挥？

亨利·乔治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学院派庸俗经济学的著作中虽把他看做“业余经济学家”^①，但是，他的经济著作，却风靡一时，畅销全球，远非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作品所能比拟。根据其子小亨利·乔治的估计，仅《进步与贫困》一书的发行量，到1905年已高达200万册。^②这主要固然由于亨利·乔治的言论迎合了当时资产阶级的需要，并且博得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阶层的同情和关心；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文笔简练而富有感情，说理明快而浅显易懂，跟传统经济学著作的艰涩冗长、诘屈聱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亨利·乔治在著书立说时，每凭直觉，激情一发，信笔写来^③，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完密的思想体系，往往自相矛盾，难于自圆其说。在亨利·乔治昼夜挥笔、埋头著述《进步与贫困》的那段日子（从1877年秋到1879年春），整个美国经济都笼罩着一片萧条景象，不少工业中心陷于瘫痪，东部的罢工风潮此起彼伏，在他定居的加利福尼亚州，更因大旱成灾，银矿倒闭，弄得疮痍满目，民不聊生。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亨利·乔治却把

① 参阅泰勒（O. H. Taylor）：《经济思想史》，1960年纽约版，第418页。

② 有人说，除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著述能象亨利·乔治那样轰动全球。参阅贝尔（J. F. Bell）：《经济思想史》，1953年纽约版，第513页。

③ 小亨利·乔治回忆其父在著述《进步与贫困》一书时，主要是借助于所谓“灵感”。见所著：《亨利·乔治传》，1930年纽约版，第303页。

经济危机以及劳动群众的失业和贫困统统归罪于土地垄断，从而形成《进步与贫困》一书的基本思想。

亨利·乔治在晚年，曾自夸“《进步与贫困》是过去出版的经济著作中最成功的一部”，并狂称“这部著作”对政治经济学做了“最充分和最彻底的考察”^①，其实，全书的逻辑推理极为简单：近代社会的物质进步造成了贫困，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私有制；解决土地私有制的办法则在于“我们必须使土地成为公有财产。”^②这就是亨利·乔治对政治经济学作了全部“考察”所得出的最后一言！怎么实现呢？亨利·乔治所建议的具体方案只有一条：“废除一切租税，单独征收地价税。”在他看来，“这没有必要去没收土地，只有必要去没收地租。”^③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指亨利·乔治）的基本信条是：如果把地租付给国家，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本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又说：‘这个人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得剩余价值的本质。因此，就按照英国人的榜样，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已经独立的部分的思辨中，即在关于利润、地租和利息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思辨中兜圈子，而他思辨的水平甚至比英国人还要低。’”^④

当然，这并不是说，亨利·乔治对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良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就《进步与贫困》一书的出版情况来看，它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确曾轰动各国。一位美国学者认为：“就培养经济学的兴趣来说，几乎没有一部著

① 见所著《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第161、162页。

② 见《进步与贫困》，1926年纽约版，第326页。

③ 见《进步与贫困》，第404、403页。

④ 1881年，德籍美国共产主义者左尔格从美国寄给马克思一本《进步与贫困》，马克思6月20日在回信中对该书作了极为深刻的评价。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1页。

作能比《进步与贫困》的贡献更大了。”^①而它之所以引起这样的轰动，就在于它大胆地宣判了“学院派政治经济学的崩溃。”^②马克思也这样说过：“乔治的书（指《进步与贫困》）以及它在你们那里引起的轰动，其意义在于，这是想从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不成功的尝试。”^③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中山对《进步与贫困》一书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难忘了。

从全书来看，在亨利·乔治的笔下，确实对“贫困伴随着进步”的“规律”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他愤怒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现象，强烈地控诉“贫困是一种罪恶”^④，“在现代城市中，贫穷的阶级和犯罪的阶级到处存在，少女冻得发抖，靠缝纫苟活；褴褛赤脚的孩童流浪街头，无家可归……”^⑤，在这些激情的控诉中，还夹杂一些他亲身遭遇的片断痛苦回忆，读后使人久久不能平静。他探索了二、三十年，试图解答“贫困同物质进步的关系”之谜，并想“从财富分配的规律下手”，“来寻求它的解决办法”，结果，发现了“这个事实：即随着物质的进步，任何地方的地租都在涨高”，“而工资和利息则并不增加”。^⑥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租吞噬了全部的利益，因此，贫困伴随着进步。”^⑦在他看来，这一切的祸根，就在于地租、地价的不断涨高，并且，“随着地价的涨高，贫困在加深”，“随着地价的涨高，才出现富豪与

① 多尔夫曼 (J. Dorfman), 《美国文明中的经济心理》，第3卷，1959年纽约版，第159页。

② 详见《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第2编，第8章。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3页。

④ 1885年4月1日他曾作过一次题为“贫困的罪恶”的演说。

⑤ 见《进步与贫困》，第284页。

⑥ 见《进步与贫困》，第4版自序。

⑦ 同上书，第222页。

贫困之间的鸿沟。”^①至于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就视而不见了。他把“贫困”也看作是一个抽象的、超时空、超阶级的概念，似乎古往今来，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国家，只要有贫困存在，原因就只有一个。他还公然宣称：“贫困的产生并不限于穷人，它跨越一切阶级，甚至也包括很富的人。”^②这样一来，他不仅模糊了阶级界线，实质上也把贫困的社会历史根源给抹杀了。

亨利·乔治论述社会经济问题的著作，相当可观^③，但是，千言万语，说到最后，他把一切问题统统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他曾说过：“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④，“因为，土地是人的住所，是人在其上取得全部需要的仓库。……我们生在土地上，活在土地上，死在土地上。”^⑤在他看来，土地是人类的唯一手段，有了土地，人类才能接近物质世界；离开土地，人就无法生存下去，他甚至称“人是土地的动物”，还把“劳动问题”说成是“土地问题的另一个名称”。他认为“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⑥基于这样的认识，亨利·乔治就把土地私有权看做“贫困伴随着物质进步”的根本原因。他这样写道：“财富分配不均的最大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就是这种土地私有权，把物质进步的幸福化为一种灾祸。就是它，把人塞满在腥臭的地下室和肮脏的贫民窟。就是它，以人填

① 见《进步与贫困》，第286页。

② 见《贫困的罪恶》，1918年纽约版，第31—32页。

③ 《亨利·乔治全集》共10卷，出版于1906—1911年间。前8卷为他本人作品，后2卷为《传记》。

④ 《贫困的罪恶》，第45页。

⑤ 《进步与贫困》，第293页。

⑥ 详见同上书，第336—337页。

监狱，填妓院，以匮乏去折磨人，以贪婪去毁伤人；它夺去了女性的温雅和美丽，也驱散了孩童的欢乐和天真。”^①总之，在他看来，土地垄断是古往今来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源。^②这里有诅咒，也有控诉；有对资本主义的颇为伤感的批判，也有人道主义学派的主观幻想，“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③亨利·乔治有时虽也猛烈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是，由于他完全不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也根本不了解土地占有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各自特点（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就轻率而武断地得出了一个简单化的结论，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依据亚细亚古代以来的大量史实，对亨利·乔治的反科学、超历史的观点作了有力的驳斥：“在亨利·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笼罩一切的原因。但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完全正确的。”“现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原因就是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地。”^④

亨利·乔治从土地垄断是万恶之源这个基本命题出发，认为医治贫困以及一切社会灾祸的灵药，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使土地成为公有财产”。他这样写道：“财富日增，贫困也日深；生产力愈是提高，工资反而愈被压低；这都是由于作为一切财富的源泉和作为一切劳动场所的土地被垄断了。要摆脱贫困，要使工资达到公正所要求的地步、即劳动者的全部

① 见《进步与贫困》，第293—294、546页。

② 他甚至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也简单地归之于土地垄断和土地投机，这里就不值一提了。

③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④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388页。